

苏南近代社会 经济史

段本洛 主编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段本洛主编.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7. 8

ISBN 7-5044-3237-7

I. 苏… II. 段… III. 经济史-苏南地区-1840~1949
IV. 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061 号

责任编辑: 赵 钢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5.25 37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80 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前 言

本书是江苏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探讨 1840—1949年间,苏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化。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各个地区之间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化千差万别。如果不区分地区,对各种类型的地区作具体的深入研究,是很难对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化有比较接近历史的科学估计。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地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符合这个认识的过程。这就促使我们撰写《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

苏南地区在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化中,很有典型意义。自从明末清初以来,苏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苏南地区,促进了苏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手工业转化为简单商品生产。农业中商品经济也活跃起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出现新的经济因素。本书意图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相统一的思考,以苏南地区为模型,探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以加深认识我们的国情,提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性参考。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近现代苏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近现代苏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变化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包括社会传统思想、习惯势力、民间风俗、社会结构、心理素质、文化教养、地理条件、交通信息、生活方式等等。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外,本书对这些因素给予足够重视。

为了对苏南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有所发展,很有必要在方法上

作些探索。本书意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把现代工业、手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作系统考察。对商品生产、交换流通、原料供求、市场信息、交通运输、资金调剂等作综合考察。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因此力图作具体的微观分析。从个性中表露出共性;客观分析,力图作动态考察。以揭示出各种经济现象内部诸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规律性东西。立足全国研究苏南社会经济,又从苏南社会经济中反映全国社会经济的规律。由于我们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的都很薄弱,又是几个人执笔撰写,各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未必能做到本书的意图。

本书研究的地区是苏南地区,包括现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三市和所属的县。主要是苏州、常熟、吴江、昆山、太仓、沙洲即张家港市、无锡、江阴、宜兴、常州、武进、溧阳等地,明末清初时加上松江府,即苏州府、太仓州、常熟府、松江府和所属各县。

本书:第一章、明清时期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由王建华同志执笔撰写初稿;第二章、鸦片战争后苏南社会经济的变化,由王翔同志执笔撰写初稿;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南社会经济的蜕变,由韦恒同志执笔撰写初稿。

段本洛

1997年7月

序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有人说：现代化就是西化。在他们的心目中，现代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模式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最近出版的《亚洲大趋势：正在改变世界的亚洲八大趋势》一书中，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就明确指出：“切不可认为亚洲现代化就是亚洲西方化”。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化过程。各个国家的转化，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有不同的方式，循着不同的变革道路，按着不同的顺序，带着不同的色彩。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异常曲折，经历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漫长岁月，又曾经学习原苏联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最终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研究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与教训，给我们许多启示。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启动的。延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主要是创办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企业，在古老中国的荒原上，出现了大型的现代新式企业和新兴的社会生产力。这些企业创办时，标榜“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在清政府压抑工商业的封建传统政策上打开一道缺口，带给私人资本追求资本增值的希望，推动社会资金流向新式企业。通过这批新式企业的创办，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和旧式商人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引进了一批先进机器设备，传播了先进科学知识，积累了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迈开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步。

可是洋务派不是资产阶级集团,而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官僚集团。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由这个官僚集团来启动,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直至19世纪90年代,伴随着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阶级力量。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带来了民族危机的深重。这时,有一批地主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所受到的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较少,具有政治的敏感性和爱国热情,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危机的深重,激起他们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对新事物的追求。他们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以维新为目的,迫切要求社会改革,变法图强,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维新派为了打通参与政权的道路,冲击着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罗网,促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们中的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著作,敲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钟,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他们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使戊戌维新成为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革旧图新的法令,制定了不少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给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气息奄奄的中国出现了一线生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曙光开始闪现。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容不得半点革新,温和的戊戌维新以流血而告终。一场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沉寂了下去。

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发动了辛亥革命。他们组织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要用武装斗争来推翻清政府,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短短几个月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令,促进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打开了人们的思想闸门,思想解放的潮流奔腾向前,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绞杀了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不可能领导人民开辟一条建设现代化的平坦道路。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指出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前途。经过北伐战争,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这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领导重任。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历史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独立、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不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可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现代化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仅占17%。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不足亚洲平均收入44美元的2/3。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不能救中国,在建国初期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转而向原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很快,我们发现了原苏联那种僵化的教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在破除对原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解放了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之后,我们开始努力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了寻找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经过不断探索,反复实践,蹉跎迍邐,受尽折磨,历尽坎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一条符合国情,适应客观经济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近百年来,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不能救中国。西化只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深渊。也曾经向原苏联学习,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按照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各经济部门发展极不平衡,传统农业经济发达,手工业有着悠久历史,而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来说,可称二元经济,从历史发展来探讨,则是多元经济的格局。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来看,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现代化机器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并举,经营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并行,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产业来替代传统产业。传统的手工业行业繁多,有的手工业技艺精湛,将长期成为现代化大机

器生产的补充;长期历史形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具有坚韧性,也不是短时期能够彻底分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成分同时并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关键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瓦解小农经济结构,根本的动力是现代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过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以及“一国两制”统一国家论。这些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闪烁着实践经验智慧的光芒,产生着巨大的威力,促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自从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博士点以来,就把研究近现代和当代江南区域社会经济,作为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以后,又着重探讨江南区域的现代化,力图探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江南区域包括苏、锡、常、杭、嘉、湖等这个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历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江南现代化研究丛书》是我们研究的成果,作者大抵是一些年轻的博士,有的成果就是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加工提高。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知识基础都很薄弱,这套丛书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恳请理论界批评指正。

段本洛

1997年7月1日

目 录

序

前 言

第一章 明清时期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1522—1840 年)	(1)
1.1 农业	(1)
1.1.1 明末清初的土地关系	(1)
1.1.2 明末清初的租佃关系	(14)
1.1.3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25)
1.1.4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28)
1.1.5 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	(45)
1.2 手工业	(55)
1.2.1 丝织手工业的发展	(56)
1.2.2 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及主要经营方式	(76)
1.2.3 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	(89)
1.3 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100)
1.3.1 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100)
1.3.2 市镇的分类	(105)
1.3.3 市镇的作用和影响	(110)
1.4 商业资本	(112)
1.4.1 商业资本的发展	(112)
1.4.2 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	(120)
1.5 封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	(132)
1.5.1 “重本抑末”政策的钳制	(132)

1.5.2	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	(138)
1.5.3	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147)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苏南社会经济的变化		
	(1840—1918 年)	(171)
2.1	手工业的变化	(171)
2.1.1	丝织手工业的变化	(171)
2.1.2	棉纺织手工业工场的产生	(191)
2.1.3	传统手工业的变化和新兴手工业的出现	(213)
2.2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	(228)
2.2.1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条件的形成	(229)
2.2.2	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236)
2.2.3	早期民族工业的特点	(258)
2.3	农村经济的变化	(266)
2.3.1	永佃制的普遍采用	(266)
2.3.2	地租与地租形态的特征	(274)
2.3.3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与富农经济的增长	(287)
2.4	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变化	(303)
2.4.1	商业资本的逐渐买办化	(304)
2.4.2	钱庄的变化	(313)
2.4.3	现代银行的诞生	(323)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南社会经济的蜕变		
	(1918—1949 年)	(329)
3.1	手工业的蜕变	(329)
3.1.1	丝织手工业的挣扎和崩溃	(329)
3.1.2	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和衰落	(343)
3.1.3	其它城镇手工业的厄运	(355)
3.1.4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凋敝	(372)
3.2	民族工业的变化和衰颓	(378)

3.2.1 民族工业的发展	(378)
3.2.2 民族工业经营和管理的特点	(399)
3.2.3 民族工业的坎坷及其衰颓	(405)
3.3 农村经济的破产	(421)
3.3.1 永佃制的衰落和地租形态的变化	(421)
3.3.2 收租局和田业大会的出现	(422)
3.3.3 灾荒匪患和战争对农村经济的破坏	(424)
3.3.4 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村人口的流动	(428)
3.4 苏南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	(432)
3.4.1 官僚资本主义在苏南的活动	(432)
3.4.2 通货膨胀下的社会经济及其全面崩溃	(446)
附录一 书中各章图表索引.....	(460)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464)
英文目录	(466)

第一章 明清时期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1522—1840 年)

1.1 农 业

1.1.1 明末清初的土地关系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存在着三种形式,即国有土地、地主占有和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其中,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形式。这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明末清初的苏南地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就这一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而言,与明代中叶以前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又带有自己显著的特点。

首先,我们看看封建国有土地的情况。

所谓国有土地,即官田。何谓官田呢?《明史·食货志·田制》说:“明土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隍菑菑地、牲地、园陵坡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官田中屯田为大宗,但主要分布在边疆(军屯)和经济残破地区(民屯);王府、勋贵、寺观庄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实际上属于私有土地。江南地区的绝大部分官田不属于以上二类,而是一种所有权属于国家,由民间经营,政府征收地租的土地所有制。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官田者,抄没入官,朝廷之田

也。民间只是耕种,未尝纳价。其每年上纳,止系官租,原非税粮。”^①同书还指出官田的来源有三:“国初,有因兵燹后遗下土田无主者,有籍张士诚者。有籍没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谓官田。”^②据《明史·食货志》,弘治十五年全国土地中,官田为民田的七分之一,而苏南地区特别是苏松二府的比例则远远高于此数。据梁方仲先生估计,弘治年间苏州府土地总面积为15 524 997亩,官田为9 778 635亩,约占垦田总数的63%;松江府土地总面积为4 715 662亩,官田为3 985 634亩,约占垦田总数的84.5%^③。

官田之所有权既然属于政府,耕种此田之人即须向官府交纳官租,这就带来了苏南赋额苛重的问题。按照洪武年间的规定,官田和民田应纳之税粮数额极为悬殊,民田每亩“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者有三合五合者”。而官田则“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④。“大抵官买田至重,籍没田次之”^⑤,其最重者有亩税至二三石者。也就是说官田之税额是民田的几倍乃至几十倍。故而,由于明初官田数额的急剧扩大,苏南的田赋额也猛增数倍。苏州府从元末应纳秋粮八十八万余石增至二百九十余万石,松江府从六十六万余石,增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故清初沈德潜称:“苏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任天下一十分之二。”^⑥

官田不仅田租苛重,而且在正赋之外,官吏、差役、漕军的层层盘剥、勒索和长途转输的耗费,更大大加重了纳租者的负担。故时人指出:“输入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故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三。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一。

③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51页。

④ 杜宗垣:《上巡抚侍郎周忱书》,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十。

⑤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⑥ 钱思元:《吴门补乘》,卷一。

亦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①“变私租为官租,乃于各仓送纳,远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②

官、私田地的负担差距既然如此之大,耕种官田者必然想方设法变官田为民田。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官田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国家,但耕种者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就成为官田转化为私田的一条重要途径。“村鄙之民,……买卖交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久而久之,“所谓官田者,非昔日之官田矣”^③。富豪地主购进土地,向官府按民田税则纳赋,而官产田的租赋却仍由售出土地的贫民缴纳,这就形成了“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民地无立锥。连阡陌者不输满顷之粮。无立锥者或办累亩之赋”^④。小民无力完粮则相率逃亡,太仓直隶州在洪武年间有8986户,到宣德七年时,仅剩738户^⑤。这就必然积下巨额浮粮,宣德时苏州一府逋赋额即达七百九十余万石。为此,宣德以后,江苏地方官员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一系列均平官、民田负担的对策。首先是江南巡抚周忱推行平米法,使官民田统一加耗,以平衡官田、民田的负担。此后,嘉靖十六年(1537年)欧阳铎等又在苏州推行“征一法”,调整官田、民田科则上的差别。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兴知府赵瀛倡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均摊。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六七斗以上,与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⑥。这样做的结果,国家的税收总额并未减少,各府、县的纳税负担也仍有倚轻倚重之弊(即每府、县税额之轻重,视原有官田之多少而定),但

① 《明经世文编》,卷十二。

② 杜宗垣:《上巡抚侍郎周忱书》,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十。

③ 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三。

④ 黄傅:《应求言议》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十五。

⑤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昭代经济言》,卷二。

⑥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消除了官、民田的差别,完成了官田向民田的转化。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

随着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衰落,官田向民田转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于是出现了超越前代的土地向地主阶级手中高度集中的状况。众所周知,地主阶级中包括了贵族地主、身份地主、庶民地主和宗族地主等不同阶层,苏南地主主要由身份地主和庶民地主构成。

身份地主: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份地主,既包括了现任和致仕的文武官员,即缙绅地主,也包括了虽无官职却有功名的举人、生员、监生等,即绅衿地主,因为他们也都享有优免等特权。苏南历来是科甲鼎盛之地。据统计,仅苏州府(不含太仓、嘉定、崇明等地),明代即中进士 971 名,清代自顺治至道光年间为 650 名。^① 这些人全都进入统治集团,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可以说是吴中官员遍天下。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江汉为天下通途,吴中往仕者指不胜屈。”故而苏南缙绅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既可享有各种封建特权,又可凭借势力,侵吞公帑,勒索民财,强取豪夺土地。即使在他们退职之后,也可以依恃在位时结成的关系网,称霸乡里,鱼肉一方。至于苏南的举人、生员、监生之类,就更多得难以计数,明代和清初,每县入学之额,一年即达数十人^②。顾炎武称,当时一个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③。顺治中发生的“江南奏销案”,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仅受到打击的生员即达 11 346 名。他们和缙绅地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身份地主集团,疯狂地兼并着土地。

在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主阶级的消

① 《同治重修苏州府志》,卷六十、六十三。

② 光绪:《华亭县志》,卷二十四。

③ 《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

费水平受到限制,加之太祖朱元璋对江南豪绅地主进行过严厉打击,明政府对豪强地主也一直采取限制政策,故缙绅地主的势力发展较缓,通过特权掠夺土地财富之风尚不十分盛行。故清初有人说:在嘉靖以前,“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宦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①。到明代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日益加剧,缙绅地主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刺激了地主阶级消费欲望的膨胀,又为通过商品交换来积蓄财富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地主阶级残酷、贪婪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风气为之一变。“士改清操,捆载而归。问田求舍,每户数千百租”^②。苏州府士人一登第,“则染俗益深,动辄以数十万为业,甚且百万以上”^③;常州府宜兴县,明季“缙绅之家连田以数万计,贫民不得寸土”^④。其间,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官僚大地主和世家大族,如内阁首辅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于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⑤,其田租仅在华亭县即岁运米一万三千石,岁租钱银九千八百余两。上海、青浦、平湖、长兴者,尚未计算在内。徐家役使的佃户不下万人^⑥。华亭董其昌“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超过万顷以上^⑦。常熟钱海山有“良田四万亩,房屋七十二所。僮奴数千人”^⑧。无锡邹望有田三十万亩^⑨。浙江湖州大地主董份,田连江浙两省,仅在苏州吴江县占田

① 陈鸿:《熙朝莆靖小记》,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58页。

② 陈鸿:《熙朝莆靖小记》,引同前书。

③ 《海瑞集》下册,“附录·传记”。

④ 储方庆:《荒田议》、《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⑤ 伍志萃:《林居漫录》,卷一。

⑥ 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

⑦ 佚名:《民抄董宦事实》。

⑧ 崇祯《常熟县志》,卷十四。

⑨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十。